

现代作家和教育

翟瑞青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正 堂

封面设计 海 东

ISBN 7-80105-625-6



9 787801 056252 >

ISBN 7-80105-625-6/G-202

定价:15.60 元

现代作家和教育

翟瑞青 |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作家和教育/翟瑞青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7

ISBN 7—80105—338—9

I. 现… II. 翟… III. 文学—研究集—中国—当代 N . I 2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713 号

○现代作家和教育

作 者	翟瑞青
责任编辑	正 堂
封面设计	海 东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安定门大街 40 号 100008)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南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7.53 印张 19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7—80105—338—9/G·149
定 价	15.60 元



作者简介

翟瑞青，文学硕士。1966年生于山东莘县，88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91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德州高专工作，95-96学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访问，97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现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省现代文学学会会员。独自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已在国家级、省级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曾多次获省、校级奖励。著作有《现代作家和教育》。

中国现代作家的教育观

——翟瑞青《现代作家和教育》序

王富仁

我们研究“五四”，有很多视角。有的主要把它视为一次文化革命，有的主要把它视为一次文学革命，有的主要把它视为一次语言革命，有的主要把它视为一次政治思想的革命，有的主要把它视为一次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教育革命。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除了我们现代人给它新增加的内容，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自然科学、法学、哲学、宗教学等等，在过去，实际上大半指的是教育学。孔子是我们的圣人，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而他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教育家。他的伦理道德学说，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某些哲学思考，他的文学观，都是在他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古代，教育并不是政治的结果，政治倒是被视为教育的结果，除了皇帝一个人是由天意决定的，是“天之子”，不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其他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是由学校培养的。他们之所以能辅佐天子治国平天下，是因为在学校里读了圣贤书。那些为人所看重的知识才能，例如诗词歌赋，也都是教育的结果。所以，这些文化，实际都是教育文化。屈原不是圣人，司马迁不是圣人，老子除野狐禅的道

教将其视为“真人”之外也不被整个中国社会当作圣人,就是因为 他们不是教育家。孔子是教育家,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学 校培养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大都是由这一代一代的知识分 子创造的、保存的、传承的。所以,孔子就成了我们的圣人,成了我 们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孔子的教育,按照我的理解,在其基础 上,是社会性的;在其培养目标上,是政治性的;在其教学内容上, 是道德性的。它是从社会青年受教育的愿望和需要中产生的,主 要是民间自己兴办的,所以它的基础在社会。但那时需要有教养、 有知识的人才的主要是国家的政治机构,受教育者所希望实现的 也是读书做官的目标,所以它以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为己任,是 政治性的。不论当时的社会,还是和平时期的政治,主要处理的是 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伦理道德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主要内 容,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伦理道德有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受教育者个人的道德修养,一方面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 原则。而这两方面又是统一的。要求别人做到的也是自己应当做 到的,自己能够做到的也是要求别人要做到的。而实现这种伦理 道德教育的手段则是语文的教育。文章是经国大业,也是进行伦 理道德教育的手段。政治性和艺术性是统一在一起的,个人性和 社会性也是统一在一起的。在外为文化,在内为道德。以文化为 表,以道德为骨。而其指归在于政治。这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 总体特征。

中国古代的教育,至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下被迫做出的。西方帝国主义用武 装的力量危及到中华民族的生命安全,而首先感到这种威胁的是 国家,是皇帝和帮他治国平天下的官僚知识分子。如上所述,中国 古代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一种道德主义的教育,但道 德是治内的,而不是治外的,制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能只靠 道德教育,而要增强自己的国力,发展经济,发展军事。所以当时

先进的官僚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这就使中国的教育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的教育思想是:既使中国的教育继续担承道德教育的任务,也使它担承知识技能的教育。而不论道德的教育还是知识技能的教育,都是从当时国家的需要出发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仅就这一点,它又和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是为国家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我称这种教育为国家主义的教育。

正是在近代国家主义教育的基础上,中国向日本、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学外国成了一种时髦,自费留学生也多了起来。这些留学生原本是在国家主义教育的目标下被派往外国的,但那时外国的教育已经不是国家主义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是社会性的。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技能不是为了作官的,而是为了在社会上谋职的。到他们“学成”归国之际,中国也废除了科举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当官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虽然教育已经不是为国家培养官吏的,但它在观念上还是国家主义的,还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些外国留学生回到中国,多数进了学校,当了教师。他们有了在外国受教育的体会,接受了外国一些思想家、教育家的思想学说的影响,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的现状有了不满,于是就发生了“五四”新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教育革命,不但他们大都是在学校里当教师的,而且提出的问题也都与教育有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都是北京大学的,只有鲁迅不是,但也与教育有关,是在当时的教育部任职的。后来的新潮社,则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创办的。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尽管导火索不是教育的事情,但“闹事”的却是一些学生,是与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再再后来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新月社等等社团的新文学作家,不是留学生,就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与教育都有直接的关系。新文化的内容,实际是围绕教育展开的。白

话文革新,首先是学校培养学生的什么样的语言能力的问题,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实际上是培养学生什么样的思想品德的问题,文学革命,实际上是培养什么样的文学人才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要任务。至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那就更是教育的问题了。这个革命,后来波及到整个社会的文化,但在当初,却是从教育上开花的。

“五四”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他们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他们这些人的思想,而不可能完全转化为中国的现实。仅就教育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教育思想是社会教育的思想,是为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的,但是当时的教育却不是由他们创办的。创办教育的主要是国家,国家之所以重视教育,不是为了哪一个受教育者,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需要。中国是一个经济、军事落后的国家,一直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需要尽快强大起来。尽管当时的政治统治者并不都是这么大公无私,但这种观念却是支持他们兴办教育的基本观念。所以,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路线,不但在那时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现在,也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合理性。是为朝野都无法否定的。所以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学作家自己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分化。蔡元培、胡适这类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事的就是教育工作,不能不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想同当时教育的现状结合起来。所以他们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社会教育的因素,也有很多国家主义教育的因素。鲁迅是个文学家,注重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所谓国民性,也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的问题。他的教育思想更带有现代社会教育的性质。但他的这种思想,是无法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得到实际地贯彻的。弄来弄去,他就学校里待不下去了。1927年之后他成了一个“专业作家”,出了学校门,其对教育的态度更充分地保留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性质。就他自己,实

际上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的民族观不是国家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的。他从人的精神素质的角度思考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仅仅从国家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的发展中看待这个问题,这就使他的教育思想同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有了更明确的差别。如果说蔡元培、胡适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当时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鲁迅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文学作家当中则更具代表性。但他们都是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其教育思想都有程度不同的社会教育的性质,不是纯国家主义的。

1949年之后,为了尽快摆脱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国家把整个教育事业置于了自己的统一领导之下,实际上加强了中国教育的国家主义的性质。这对于国家教育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无疑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但当一个民族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民族危机感逐渐薄弱下去、整个民族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时期,国家主义教育是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主义教育的。在这时,知识技能的作用不那么急迫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又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在国家统一领导之下的教育强化的是政治思想的标准,知识技能自然就要受到程度不同的忽视。我认为,正是这种政治主义教育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光。这个“革命”是在教育领域进行引爆的,它反映的不仅是政治领域的矛盾,同时也是教育领域的矛盾。在那时,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都被摧毁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重新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秩序,教育也重新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为中国的教育重新走上了“正规”,此后的问题就是一个简单地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的问题了。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实际仍然是未得到基本解决的。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强烈起来。按照我的看法,这实际上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经济上的社会化和社会思想上的社会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仍然

停留在国家主义教育的固有模式中,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仍然同文化大革命前的国家主义教育没有本质的不同,教育与社会的矛盾尖锐了起来。在这时候,我们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感受和认识。在过去,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成了“无产阶级”,我们的教育也“无产阶级化”了,那些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就是鲁迅,也不过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与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相提并论。对他们的教育思想,有意与无意的,就不那么重视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的,过去人能感受到的真理,后代的人很可能又感觉不到了。在教育上也是这样。“五四”那代人,由于古代的东西已经明显地不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他们要重打锣鼓另开张,所以考虑问题往往要从根子上来考虑,而我们这些人,生下来就是在“五四”那代人开始的新局面中生活的,不太好从根子上考虑问题,前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上级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搞来搞去,就走到死胡同里来了。所以,在我们重新感到教育应当改革的时候,重新回过头来想一想“五四”那代人的意见,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教育已经很普及了,它实际上早就成了一项社会的事业,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成员的人生命运的问题,而不再仅仅是国家的事,政府的事,不再仅仅关系到国力的强弱,而中国现代作家那种“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就很重要了。

翟瑞青女士于1995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访学,当时她提交的研究课题就是《中国现代作家论教育》。这个课题,在当时还是很新颖的,除了对个别作家的个别研究之外,还没有人这么系统地研究过。在访学期间,她不但选了中文系的课,还选了教育系的课,读了一些中国古代和外国教育家的著作,系统地搜集了中国现代作家有关教育的论述,写成了该书的初稿。回校后,她获得了国家的资助,对该书稿又做了重新的加工整理,完成了这部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在这部书就要出版的时候,恰恰正是中小学语文

教学改革的讨论方炽的时候,虽然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中国现代作家教育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明白的,但不能不说,翟瑞青女士的这部书是一部适时的好书,她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希望人们能够重视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把这个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1999年5月2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读《现代作家和教育》

季桂起

任何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都有赖于新人的出现,有赖于对新的研究视角的选择。把现代作家和教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现代作家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及特征的考察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审视现代教育的性质与特点,这无论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是现代教育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新颖的视角。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局限,文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处于颇为隔膜的状态。本来在实际的社会发展中,文学和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学科之间的壁垒和研究方法的单调使它们难以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等方面的解放和革新,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推动了一大批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课题的涌现。而翟瑞青女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上了她的学术道路。由于得力于时代思潮的充分影响和新观念、新方法及新知识的熏陶,她起步伊始便选择了“现代作家和教育”这样一个不同学科交叉、渗透与碰撞的研究课题。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

现代作家和教育是一个有着较大难度的课题,它既需要研究者对于两个学科都须有着较为丰富的知识积累,又需要研究者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术经验等方面有着比较充分的准备。尽管

今天看起来,翟瑞青女士的这部著作在这些方面尚有所欠缺,但她无疑为此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这一努力使她在研究过程中,能够比较深入地通过丰富的资料考察与理解研究对象,悉心体会研究课题所包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由此而发现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内容。

《现代作家和教育》这部著作最突出的特征,我以为是在于作者对其理论视点的独特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形式与发展,有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的大交汇、大冲撞,以及在这一交汇与冲撞中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转型。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教育其实都是这一社会及文化转型的产物。由于文学和教育的渊源关系,它们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既共同承担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责任,又不可避免地互相之间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使它们之间可以彼此参照,使研究者可以从中发现某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来说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应该说,这一理论视点的选择,本身便包含着新的学术意义。站在这一视点上,作者既宏观地看到了整个现代教育模式形成的历史机制及现代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梳理了现代作家与现代教育之间的文化关系,又微观地透视了现代作家的教育观念、文学观念及其独特的精神现象所产生的历史过程与文化动力。这样就使人能够在比较深入地了解现代教育思想及教育体制在中国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文学生成的历史条件,同时也为人们认识一些现代作家的思想渊源、人格渊源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起来,作者在本书中对于整个现代教育形成的历史机制及现代教育思想的内涵发掘得尚不够深入,在这方面今后还大有研究的余地。

正是由于对这一理论视点的选择,作者也找到了特别适合于自己研究内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比较文化的方法。对于自己的

研究对象,作者特别注意从中西文化比较、古今文化比较的四维结构中实现它们的特点。这种文化比较的方法一是为研究者提供了宏观的视野,使其能够从深远的历史关系、文化背景上认识具体问题;二是体现了价值多维的思想,使研究者的观点、结论较少受某些固定教条的束缚。如对于鲁迅的“立人”教育、冰心的“母爱”教育、丰子恺的“艺术”教育、夏丏尊的“情感”教育、巴金的“个性”教育、朱自清的“人格”教育等诸多现代作家的教育思想,作者都因为有这样一种四维结构的文化比较方法而能够从中提炼出它们所具有的不同的现代文化意义,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到现代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再如作者对于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两派作家之间教育观念差异的发现,对于北大与清华两所大学之间因不同历史文化关系而产生的不同教育指导思想的认识,也都是得力于这样一种文化比较的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从不同层面完整地理解现代教育思想的文化内涵都不乏启发性的意义。

我觉得,比较文化的方法很自然地赋予了作者一种开放的学术眼光,使其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能够更好地进行历史定位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自己独具个性的发现。如对梁实秋的教育思想加以特别的注意,是本书的一个颇有价值之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梁实秋在近些年来的学术界已受到人们较多的关注,但作为教育家的梁实秋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本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特别指出了梁实秋教育思想在对中西文化的不同选择与继承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因其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交流文化倾向的差异性而显示出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此不应以“保守主义”给予简单的否定。在建构中国现代多元文化和多元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梁实秋的存在应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同样的发现还表现在对朱自清“人格教育”思想的论述上。作者指出:提倡“个性解放”为五四新思想的一大特点,这曾经启发了许多现代作家教育思想的形

成,如鲁迅、胡适、陈独秀、叶圣陶等人,但在教育实践上能够把这一思想贯彻为具体的教育内容,给予受教育者以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人格塑造,最具操作价值的是朱自清的“人格教育”思想及其运作方式。这一发现,对于提高朱自清作为教育家的地位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同时对人们更深入地去理解现代教育思想尤其是“素质教育”的特点也具有现实的启发性。

当然,在完成“现代作家和教育”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尽管作者付出了极为刻苦而艰辛的努力,但由于课题本身的难度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之处。首先是全书在理论构架的设计上还缺少更为完整而严密的系统性,这既使得作者的一些思考与观点未能充分展开,如对“现代作家教育思想现代性”的论述,也使得全书的结构存在着布局、间架上的不均衡现象,影响了全书的理论深度与整体感。其次是对具体作家教育思想的论述,力度不够均衡,阐述方式也不够一致。我认为其中写得比较出色的是关于鲁迅、冰心、王统照、夏丏尊、老舍、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教育思想,而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教育思想则写得较为平面化、一般化。尤其是对胡适的教育思想,过于局限于沿其生平教育经历的线索进行纵向描述,缺乏理论的概括和提炼,这样就很难深入探讨胡适教育思想的深层内涵。再次是在对个别现代作家教育思想的认识上,缺乏足够的理性批判的力度。如陈独秀的“实用”功利的教育观,虽因提倡科学教育而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观有较大冲击性,但其片面性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其中机械唯物论的成分,即便在当时也同现代教育思想以美育为主的发展主流有相悖之处,对此本书显然是价值认同和地位肯定多于批判性的反思。

我同翟瑞青女士共事多年,彼此在工作上、学业上都有着比较深的交往,因此本着“交友之道无过于诚”和直言不讳的原则,说了上面这些话。其不当之处,相信作者自会甄别与谅解。其实,虽然

我个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十几年时间,但对于“现代作家和教育”这样一个极有深度与难度的课题也是颇为陌生的,读了翟女士这部著作后,我自己也深感获益匪浅,它从知识、观点、方法等诸多方面也都给了我不少的启示。能够为本书写这样一篇读后感,我自是颇感荣幸。惟愿翟女士今后能再接再厉,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1999年6月28日草成